

“我什么都能，就是不能倒立”

——记一位“举世无双”的音乐家

张卫奇

世界上有很多造诣高超的出色音乐家，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位，堪称“举世无双”。

2018年夏天，明斯特大学音乐学院聘请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我们虽然院系不同，但他也算是我的新同事，上星期天我有幸在明斯特歌剧院参加了一场专门为他举办的音乐会。

他是一位法国号演奏家，也是一位“举世无双”的音乐家！

法国号，也称为圆号，是一种由唇振动而引起气鸣的铜管乐器，铜制螺旋形管身，漏斗状号嘴，喇叭口较大。它通常有四个键，其中一个键用来转换指法调性。

法国号虽属于铜管乐器，但它不仅能吹出嘹亮的铜管声音，也能吹出柔和的木管声音，其声音柔和、丰满，最适合与木管和弦乐器共同演奏协奏曲。

在那天的音乐会上，独奏的年轻音乐教授菲利克斯·克立泽（Felix Klieser）才28岁，却已经是一位世界级出色的法国号演奏家，他的音乐造诣之超群可见一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从出生起就没有双臂，必须用脚代替双手演奏法国号，而且他能用脚将法国号操控到最高境界，无时不展现出他的精湛的技巧，更体现出他对音律的精彩诠释和深刻乐思。

在大、小提琴的陪伴下，他演奏了莫扎特和海顿的《法国号协奏曲》。法国号的声音在他操控下时而高亢激昂，犹如海水拍打着海岸；时而委婉低沉，犹如慈母呼唤着久别的孩子；时而又清脆嘹亮，犹如徐徐的清风吹拂着翠绿的竹林，不断地演绎出动听的旋律，展现出唯美的风韵。

再看他纤细的左脚随着旋律在那法国号的键上飞快地跳跃动作，就像纺织工灵巧的手在纱锭间翻动，像春燕快乐的翅膀在云中飞舞。他演奏的乐曲，似乎能将你的心灵从喧嚣和冗杂之中带出，带来一片宁静，让你平静下来，让你神怡心旷。面临此景，我惊叹无言……

克立泽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他——1991年，克立泽出生于德国哥廷根，从一出生就没有双臂。四岁那年，他听见别人演奏法国号的声音，非常喜

欢，就告诉父母：他要学这项乐器。他的这个主意把父母吓坏了，法国号不仅需要用嘴吹，更需要用手操作，而且有的时候需要用双手操作，属于很难学会的乐器。

那时，他的父母虽然很支持他学音乐，但觉得他不适合学法国号。为了更有力地说服他，父母就带着他去了哥廷根音乐学院，希望能得到那里老师的帮助和指点，劝导克立泽放弃法国号，改学一种简单的乐器。可是克立泽年纪虽小，意志却很坚定，下定决心一定要学法国号。

开始的时候，他太矮小，老师只能将法国号放在地上，克立泽坐在地上跟着老师学着用嘴吹，用左脚代替左手来控制法国号的气流阀键；以后他长高了，老师就将法国号放在桌子上，站着继续练习；再以后，他又长高了，桌子都不够高，他父母就委托一位乐器制作师为他特制了一个金属支架，将法国号放在支架上，让他坐着继续练习……

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哥廷根大学当教授。陪着儿子去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时，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时常看到克立泽的母亲带着他去上课。有的时候，孩子们在教室里上课，我就跟他的母亲闲聊，也在音乐学校的年终表演大会上听过他的演奏。

他母亲告诉我这么一个细节：一般法国号演奏家除了用左手来控制气流阀键，时常需要用右手遮住喇叭口来变化音色，但这种操作对他来说十分困难。可是他依然不愿放弃，不辞辛苦地反复尝试，另辟蹊径地用嘴和唇的巧妙动作来达到“遮住喇叭口”的特殊音色以及相似效果。看到他的表演，又听着他母亲的叙述，更令我啧啧称奇。

克立泽不仅仅有天赋，更有坚定意志，为了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技能，保持最高的演奏水平，他一直坚持练习，至今每天起码练习八个小时！

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十三岁时就破格考入汉诺威大学音乐学院，作为少年学生学习法国号。本科毕业以后，他便以独奏家身份在世界各地巡演，并与西德意志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录制多张专辑CD。

他也曾在柏林爱乐首席指挥拉图（Sir Simon Rattle）以及其他著名指挥

凡萨戈（Mario Venzago）、戴维斯（Dennis Russel Danies）的指挥下与一些著名的乐队共同演出，并受邀参与史汀的摇滚传奇世界巡回德国场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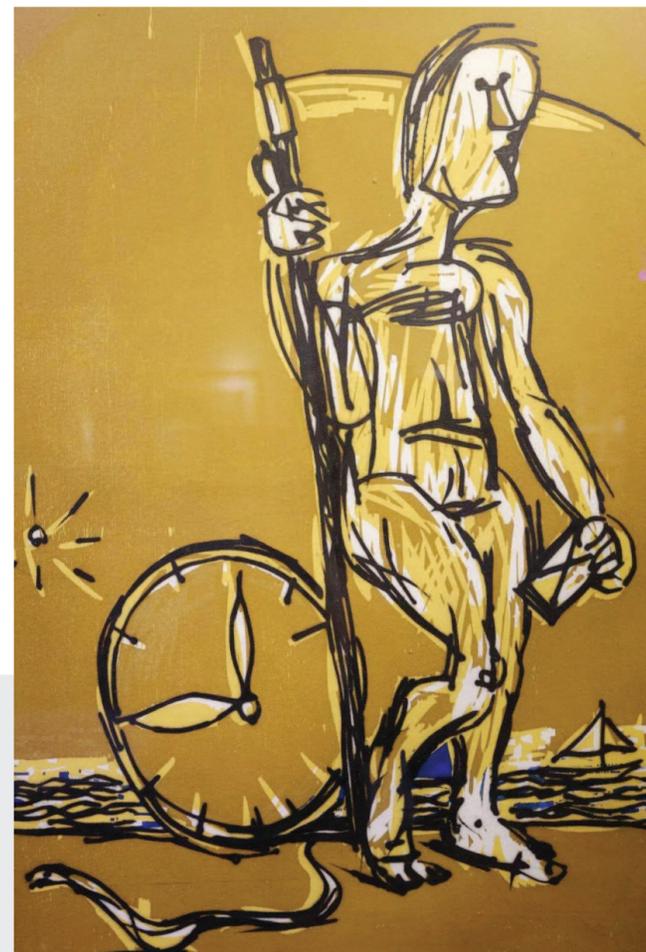
2013年，他的第一张专辑《遐思》（Reveries）问世，得到专业媒体和公众的高度评价，并赢得德国2014年“回声古典音乐大奖 ECHO Klassik”的年度新人奖，获得各方瞩目。他也应邀到日本和中国台湾举行巡回演出。

2014年，他在一位记者的帮助下写了一本自传《Fussnoten》，这本自传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音乐脚步》。在书中，克立泽通过幽默而轻松的方式叙述了自己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也揭露了音乐家舞台上与常人无异的普通日常。

天生缺少双手臂的菲利克斯·克立泽在人生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实在太多，生活上的，乐器上的，演奏上的，虽然如此，他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缺少什么。跟一般人一样，他也有过顽皮捣蛋

的童年，以后上学求学、学音乐、演奏、写作，他都以自身强韧的意志为自豪。而他以脚演奏的法国号，不仅大大改变了世人对于法国号演出的想像，他优秀的音乐技巧与克服身障的人生经历更不断地震撼着人心。

2018年12月写于德国明斯特



流逝的时间

(木刻版画)

马库斯·吕佩尔茨

买画的乐趣

邢小群

笔会

谈艺录

好友王东成夫妇从美国旅游归来，给我们带来了一幅瓷艺画。他是从一家旧货店淘来的，画框有着原木的质感，我很喜欢，也很感动。因为这艺术品，分量不轻，且易碎，放在箱子内，若遭碰撞怎么办？他就一路提着回来了。

由此勾起我们两家十几年来出外旅游，一路赏画、买画的故事。

记得第一次买油画，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广场一侧的小巷子里，我进了一家不大的画店，高低大小的油画，琳琅满目。欣赏中，我发现了一幅约一尺长七寸宽的小油画：远远近近的向日葵，最前那排的那几株，格外的金黄摇曳，天空好像被它们涂抹成了黄色。在它们面前驻足，似能闻到阳光的味道，突兀的葵花籽们努力显示出成熟之色，立体得触手可及。一问，35欧元。决定立即购买。王东成知道后，也赶紧迈进了这家画店，因所有的画都是唯一的，他挑了另一幅。从此，知道他也爱画，而且比我们更甚，旅途中便总是一起寻找画店。

最初，不大在乎画作的品类。比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看到现场作画，与画者的切近，湿漉漉的色彩，包括钢笔画在内的真实笔触，让我们感到新鲜。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总统府前，我们家、王东成夫妇、赵诚都买了水彩画，结果回国时，赵诚的旅行箱在转机时被雨淋了，把画毁了，他特别遗憾。我们想，赵诚兄刚加入买画队伍就受挫，不能打击他的情绪，就把我们那幅送给了他。以至于，已经记不起在当年买了一张什么水彩画了。

2008年我们去朝鲜开城，也买了一幅。画面是古都园林的景象，用中国的水墨的笔法，画在布上，构图却是西洋的透视，空间感很强，功底不凡，我们不认识画家的签名，仅20美元。

在希腊，我们下榻的宾馆附近有一个旧货店，我先生看到一幅很好的油画，徘徊多时，因为价格贵，没有买。临出发上车前，一个旅友听说了，匆匆跑去，二话不说，买了下来。回来一查下面的签名，真是当地著名画家的作品。

有时画作的材质也很吸引人。2018年年初我们去了一趟老挝。在那里，有一种土纸工艺。大象食草，粪便多纤维，以此为原料生产的土纸比中国的宣纸粗糙，画画却很有质感。在千年古城琅勃拉邦的夜市上，我们买了一张在土纸上绘制的油画：月光下的挑担女人，印象派手法，人民币100元。还有一张，好像是旋转中的舞蹈，没有看懂意思，就没有给王东成也买一幅。回来后，隔距离观赏，挑担女人确实生动，因不舍割爱，将买的另一幅土纸画“归寺的童僧”送给了他们。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遗憾。

在南非，“桌山”是开普敦的标志性景观。它生生将一座住宅密集的城市劈成两半。我们买下一幅夕阳下，红霞满天的“桌山”。感觉挂在光线好的房间，色彩更加强烈。王东成挑画时没有太满意的，在遗憾中上了车。不想，我又发现了一幅小尺寸“桌山”。那是乌云密布下的“桌山”。就让同好王东成“占为己有”吧，这也是它的缘分。听说以色列的港口城市雅法有一条街都是美术店，我们兴致勃勃地去了，才发现那天因为是星期天，多数店铺关门。在仅一家开着画店，我们挑选了一幅戴帽子的犹太老人。感觉他的眼神和面容尽写着智慧和博学。80美金。王东成选择了一幅淑女、香车、绅士、雨伞意韵古典，手法细腻的街景画。这是一位格鲁吉亚画家的作品，有画家签名，230美元。

在尼泊尔，我们买了一幅尺幅较大的喜马拉雅山风景，100美元。王东成、赵诚也买了景致不同的喜马拉雅山。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奥林匹亚，我们几人都买了尺幅不等的油画，每幅价

格二三十欧元。可能是来自大芬村的批量仿制，但质地确是油画，所画的内容也是希腊的场景，仍不失纪念意义。

我们旅游往往自行组团，定制线路，凡博物馆、美术馆，尽量入内。以至于希腊的导游说，迄今为止，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个团的人那么爱看博物馆。我们去巴黎，强烈要求把去老佛爷购物的时间留给卢浮宫；王东成到纽约大都会，看了六个小时，要不是有事，还是不想出来。

那年，我们游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小城，在自由活动的半天里，是自己到处打听、买门票参观十二月党人的博物馆和当地的美术馆。美术馆不大，却让我震动不小。这里的藏品水准与圣彼得堡的冬宫相比，并不逊色。在俄罗斯看到列宾、苏里柯夫的原作真是享受。列宾就是列宾，一眼看去，那么出众，那么抢眼。伊尔库茨克美术馆有两幅画，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一张是教室门外，向里探望的男孩子，他上衣补丁擦着补丁；下身单裤的破洞露着小腿；脚上与其说是鞋，不如说是由布条和草绳组成的裹缠。他双肩背着一个单布兜，斜挎着一个薄布兜，都不满。双手拄着一根细棍子，棍梢上有一顶黑帽子。他面向教室，看到的是一群孩子正在低头看书。画面虽然是男孩的背影，却让我想到法国作家埃克托·马洛的小说《苦儿流浪记》、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但孩子的肢体话语表明，他并不悲戚，而是充满好奇。这幅画的深棕色调在阳光下，凝重却不寒冷。这种感受，我前所未有。另一幅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身着之衣如干疮百孔的碎布片，比蓝楼还要蓝楼，眼神中透着惊恐。看了这幅画很容

易去想：这是什么年代？在哪里？这幅画也是该美术馆纪念册页的封面，可见这个美术馆风格的整体追求。

2015年，我们去伊朗寻访波斯古国的文明遗迹。在大不里士古城有着千年历史的大巴扎里，我们买到一幅羊毛挂毯。画面是两个年青的伊朗女子：一个围着棕色丝绒的围巾，一个围着乳白色围巾，都是虚虚地搭在头上；一个身着蓝布裙，一个穿着牛仔裤，坐在水泥凉台上，裸足下是花纹地毯；一个戴结婚戒的手上拿着书，神情落寞，另一个目光同情地看着对方，她们在私语。这是婚后的姐姐向妹妹倾诉吗？姐姐身上的黑披风，显得她不如妹妹更自由自在。这幅画的背景是巴列维时代。当时伊朗政教分离，世俗化水平较高，姑娘们的穿着较为随意。我们旅游期间，看到一群学校中的女孩子们，已经是黑袍围裹，只露出美丽眼睛的模样。这幅高一米多、宽八十公分的挂毯，人物气质高雅、线条明晰，是我们买的最贵的艺术品，500美金。后来在伊朗境内一路走来，再也看不到具有类似意韵的挂毯了。回到北京用油画框装成，谁看了都以为是一幅油画。

因为和王东成夫妇是多年旅友，如果我们家单独行成了，回来赠送纪念品就尽可能多是艺术品，聊补没有同游的缺憾。2016年我们去了一趟新西兰。给王东成夫妇的礼物是一幅小油画。画面仅仅是一簇狂涛剧烈腾起的海浪，海浪高处如一堆白雪。王东成非常喜欢。经常作为他拍摄家照的背景。我想，他更喜欢这簇海浪传达的精神：无畏而昂扬！而我们在旧货店淘了一幅镶金边的云霞映在湖面上的晚景，那落日在湖面上的色彩异常丰富。

在去过的数十个国家中，我们几乎都买了风格不同或质地不同的画。我们不是学美术出身，也不从事艺术收藏，买画、赏画只是为了给旅途留下一段特殊的记忆。有人文的自我解读，也有共同爱好的友谊收获。好友彼此串门时，总是你欣赏我的，我欣赏你的，一起买画时的情景也立即浮现在眼前，乐趣悠然而生。

1912年末，普鲁斯特按照最初的写作计划，已经基本完成了三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面对即将到来的1913年，他最大的新年愿景就是能将自己的心血之作尽快出版。

此前他已联系了多家出版商，包括法斯盖尔、新法兰西杂志（同时也是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和奥朗多夫。然而岁末年初他等到的，却是三家出版社相继的退稿。先是1912年12月24日，法斯盖尔根据其审读委员的意见，将普鲁斯特寄去的小说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退给了作者。

类似的情况几天后也发生在普鲁斯特最寄予希望的伽利玛出版社。在杂志和出版社合伙人舒伦贝格的家中，每周四都会举行社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舒伦贝格外，还有出版商加斯东·伽利玛，合伙人、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秘书长雅克·里维埃，以及分管杂志的雅克·高博。

已经享誉文坛的纪德因其特立独行的思想和坚定的人格魅力，成为这个团队里的灵魂人物。据说他在会上就普鲁斯特的作品大致说了如下几句话：“这部作品里尽是些公爵夫人，不适合我们出版，（……）况且，该书是题献给《费加罗报》主编卡尔麦特的。”会后，加斯东·伽利玛将普鲁斯特的稿退还给了他。

1913年新年伊始，普鲁斯特竟然又收到了第三位出版商奥朗多夫的退稿。该出版社经理恩布洛在写给奥朗多夫的一封信中如此提到他对普鲁斯特作品的印象：“也许是我冥顽不灵，然而我无法理解一位先生能够用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他半夜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段话无疑是指《追忆似水年华》那著名的、漫长的、曾令许多人不得要领的开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地就睡下了。……”

于是，伟大作家普鲁斯特1913年的新年愿景，便是竭尽全力找到一家愿意出版他作品的出版社。2月中旬，普鲁斯特给好友勒内·布吕姆写信，请他向年轻的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推荐出版自己的作品：“我希望格拉塞先生能出版一部我已完成的重要著作（……），出版费和广告费由我自负。”这部“重要著作”，普鲁斯特将其称作“某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包括两卷，每卷大约650页。普鲁斯特在信中强调愿意自费出版，原因之一是不希望出版社改动他的著作，之二是希望作品能尽快出版。

3月11日，格拉塞出版社和普鲁斯特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规定，该著作的出版和广告费用由作者自负，销售定价为每本3.5法郎，每售出一本作者可以获得1.5法郎的版税。这一年的11月14日，一个文学史上重要的日子，《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开始在书店正式发售。至此，1913年普鲁斯特的新年愿景总算在这一年的岁末达成。

伽利玛出版社很快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大错。加斯东·伽利玛和雅克·里维埃就普鲁斯特的著作进行了一番长谈，他们对社务会议作出的愚蠢决定深感内疚：“我们简直是疯了，这是一部顶级的作品，比我们出版的那些朋友们的作品优秀太多了！”于是普鲁斯特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对这部作品的拒绝将是《新法兰西杂志》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我本人因此负有主要责任而感到羞愧，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和内疚之一。”

加斯东·伽利玛亲自登门拜访普鲁斯特，向他解释原因并表达歉意，希望他能将其余的作品全部交给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普鲁斯特告诉伽利玛，他已在格拉塞出版的《在斯万家那边》和其余的内容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除非伽利玛能从格拉塞那里买到小说第一卷的版权，而普鲁斯特认为这并不困难，因为第一卷毕竟是他由个人自费出版的。此后普鲁斯特就改换出版社一事征得了格拉塞的同意，但是他又感到这么做不够得体，有些对不起格拉塞出版社，因为当初在被包括新法兰西杂志在内的三家出版社先后拒绝后，毕竟是这家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追忆》的第一卷。于是改换出版社的事便拖延了下来。

几个月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家出版社的运作完全停顿下来。普鲁斯特因为健康问题未被征召入伍，大战期间，他的愿景已不再是出版，而是写作，不断地写作，最终完成他心目中那本“唯一的书”。他将大量时间用于全面修改、大幅扩充《追忆似水年华》，从整体结构到具体内容，都做了重要调整，一战也被作为重要的时代背景，写进了《追忆》的最后一卷《重获的时光》。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追忆》已从最初计划的三卷本扩充为七卷本。

战争期间，格拉塞出版社发行的《在斯万家那边》仍然在继续出售，至1916年初，该书已经再版了四次，然而格拉塞从未支付给普鲁斯特一分钱的版税。更为不幸的是，旷日持久的战争让普鲁斯特的理财投资损失了大笔资金，他写信给格拉塞，说他感觉自己“几乎破产了”，正在“以任何价格变卖家产”，希望能够得到自己应有的版税。格拉塞没有回应普鲁斯特的正当要求，这迫使普鲁斯特重

普鲁斯特的新年愿景

黄晞耘

新考虑改换出版商，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伽利玛出版。1916年2月25日，普鲁斯特让女管家塞莱斯特给纪德送去一封信，纪德收到信后当天便到普鲁斯特家拜访，为曾经拒绝出版《在斯万家那边》向他当面表示歉意，并再次希望他能将《追忆》的后续内容交由新法兰西杂志出版，并且说这是出版社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希望。

于是，1916年的那个春天，普鲁斯特的新年愿景变成了：改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全部作品。经过多番书信沟通和谈判，格拉塞终于同意将《在斯万家那边》的版权卖给伽利玛。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在巴黎东北郊的贡比涅森林签署停战协议，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年6月底，《追忆似水年华》的前三卷《在斯万家那边》《在蓟花少女的身影里》《盖尔芒特家那边》终于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同时也在书店发售。文学界和广大读者这次很快意识到了普鲁斯特作品的非同凡响。这一年12月10日，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刚刚出版《在蓟花少女的身影里》五个月的普鲁斯特。

然而，早已透支了健康的普鲁斯特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他生命最后几年里的最大的愿望，一直是希望能看到《追忆似水年华》的全部七卷面世。1919年5月他在写给加斯东·伽利玛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个愿望：“但愿整部作品能够在我生前问世，假如情况不能如我所愿，那么我已将全部手稿编了号留下，请您届时取走，并希望您能将它们完整出版。”

1922年，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的新年愿景是和死神赛跑，尽最大限度地修改、扩充和完善余下的手稿。直至在病榻上陷入昏迷之前，他还在修改小说第五卷《女囚》的第三份打字稿。根据女管家塞莱斯特的回忆，这一年初春的一天，普鲁斯特将她叫到跟前，说：“您知道，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个天大新闻。我为《追忆》写下了‘终结’一词。”他始终面带微笑，眼里闪着光补充道：“现在，我可以瞑目了。”塞莱斯特提醒他，可能还会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还会有些增补的纸条需要粘贴到手稿上。普鲁斯特答道：“这些嘛，塞莱斯特，是另外一回事了。重要的是，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再担心了，我的作品可以全部问世了。我这辈子总算没有一事无成。”

1922年5月初，《追忆似水年华》的第四卷《索多姆与戈摩尔》开始发售。几个月后，普鲁斯特的健康开始恶化。11月初，他最后一次写信给加斯东·伽利玛，信中说：“我认为眼下最为急迫的应该将我的全部作品都交给您。”对于即将到来的1923年新年，他的愿景毫无疑问是能够亲眼看到《追忆似水年华》的全部内容都能问世。他的支气管炎转为严重肺炎，11月7日夜里，他为《追忆》中作家贝尔戈特之死的情节补写了两个片段。次日他的病情再度恶化，开始神志不清口吐谵语，说他看见了“一个身形庞大的黑衣女人”，凌晨四点半，《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与世长辞。他最重要的愿景，未能在即将到来的1923年新年实现。

六天后，第五卷《女囚》印刷完成。1925年，第六卷《失踪的阿尔贝蒂娜》出版；1927年，最后一卷《重获的时光》出版。1954年，《追忆似水年华》作为文学经典，收入伽利玛出版社著名的“七星文库”。